

近年来海外资源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双重效应

秦弓

【提要】近年来,海外资源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其中既有积极的一面,如文学史观念的更新、学术视野的拓展、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也有负面效应,如张冠李戴、任意发挥、盲目求新等,值得深刻反思、认真澄清,以便科学地借鉴,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与海外展开平等的对话。

【关键词】海外资源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双重效应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1)01-0112-07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如同其研究对象一样,始终与海外资源有着密切的关联。早在学科萌芽阶段,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①就带有进化论与实验主义哲学方法的色彩。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②与《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③也见得出五四前后传播进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学科正式确立,直到“文革”,现代文学史著述,大多强调思想斗争、政治斗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力图以文学史来验证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理论观点,这种模式明显留有《联共(布)党史》的投影。

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术资源的援引与海外资本、技术、管理经验和物质产品的引进大体同步,虽然不无曲折,但总体上乃大势所趋,随着思想解放的发展,留学浪潮的递进,学术队伍外语能力的提高,学术交流渠道的多样化,海外学术信息得以源源不断地涌入,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既有显而

易见的积极作用,也有不容忽略的消极效应,学术界对此已经有所注意,本文进一步予以分析,以期激浊扬清,科学地借鉴海外资源,建构富于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

一、积极影响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海外资源大为拓展,就性质而言,一是海外汉学,二是广义上的文化研究。就方位而言,西方主要是欧美,东方则主要是日本。海外资源的积极作用,主要有如下三点:文学史观念的更新、学术视野的拓展、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第一,文学史观念的更新。

① 收入《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商务印书馆刊行,无出版时间,从抱一的《编辑余谈》写于1923年2月来看,可能刊于1923年。亦收《胡适文存》第2集卷2,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

② 中华书局1929年版。

③ 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①代表了“文革”前十七年现代文学历史叙述的最高成就。著者曾在清华大学朱自清门下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在中古文学研究领域取得骄人成绩之后，受命参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正式创建。他在撰写《中国新文学史稿》时，力图“多以作品和史实为依据，少写空泛的议论和分析，点到为止，不多渲染，要言不烦，留有余地。”^②这部著作的确以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而见长，而且因此被批判为“客观主义”。但是，由于学科的创设承载着证明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必然性与合理性的政治使命，《中国新文学史稿》作为“第一部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作为理论根据，以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学界定现代文学性质编写的文学史”，^③在史料的取舍、作品的评价等方面，不能不服从于政治使命。直到1980年12月出齐的三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史》，^④仍然留有明显的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的痕迹。

现代文学固然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有着密切的关联，但是，文学的发展进程毕竟不会与政治史完全重合，因而，当改革开放的时代唤醒了全面还原现代文学史的要求时，既有的政治化文学史观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版早在1961年即已问世，其时，中国大陆正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不可能对其产生兴趣；而到了1979年，中文版一经香港友联出版社推出，立即在大陆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政治上的义愤有之，学理性的批评亦有之，但这部著作迥异于大陆著述的文学史观的确让人耳目一新。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初版序言中说，“本书当然无意成为政治、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附庸。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发掘、品评杰作。如果他仅视文学为一个时代文化、政治的反映，他其实已放弃了对文学及其他领域的学者的义务。”^⑤“首要任务是发掘、品评杰作”，才能使文学史回到文学、回到文学的历史。夏著带来的新气象不仅仅是对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的高度评价，更为重要的是看重审美价值的文学史

观。这一文学史观的引进与接受，对于重构文学史的叙事框架，把现代文学史从文艺运动史、文艺思想斗争史还原为文学史，重新评价沈从文、师陀、张爱玲、钱钟书、穆旦等作家与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等流派，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启迪作用。审美研究得到重视，小说方面，有文化原型的追溯，有叙事模式的研究，也有诗化、象征化、音乐性、绘画感的探索；诗歌方面，有意象、情调、语言、节奏、音律与内在结构的分析，有戏剧化与摄影化等手法的索解；话剧方面，有广场剧与剧场剧、心理剧与社会剧、写实剧与象征剧的辨析，有“动作”、潜台词、结构艺术、灯光舞美与表演导演的研究；散文方面，有絮语体、对话体、讲演体、抒情体、闲话体等类别的区分，也有语汇、语调、意象、意境、幽默、反讽等细致的解读；多种文体的演进脉络与艺术成就得到了系统的梳理与总结。

关于现代文学的近代源头，早在前述胡适、陈子展的著作中即已涉及，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也把1898年至1917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简述”列为“附编”，以两章的篇幅予以叙述与分析。1985年全面展开论证的“20世纪中国文学”^⑥概念，可以说是这一学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贯通20世纪或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的著述不胜枚举。关于现代文学之现代性及其渊源的探寻，至迟也可以追溯

① 上卷，开明书店1951年版；下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全书于1982年11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

② 转引自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兼及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钱理群等编著《王瑶和他的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06页。

③ 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兼及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钱理群等编著《王瑶和他的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11页。

④ 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册1979年6月出版，第2册1979年11月出版，均署唐弢主编；第3册1980年12月出版，署唐弢、严家炎主编。

⑤ 转引自祝宇红《夏志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及其批评谱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2期。

⑥ 莫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到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用现代性来界定现代文学,已经成为认可程度相当大的共识。^①在这种背景下,王德威提出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在争议声中推进了现代性之本土资源的发掘,拓展了雅俗等多条线索交织互动的文学空间,也加强了对进化论文学史观的质疑。^②如今,现代文学史不仅摆脱了绝对化的“政治决定论”,敢于体认自身的文学本性;也走出了单一的“革命决定论”,回到了未曾中断的历史脉络之中。

第二,学术视野的拓展。

海外汉学以其自由的思想姿态与宽广的文化视野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学术视野的拓展。余英时、杜维明等新儒家在大陆反响强烈,褒贬不一。其中,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影响,首推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③因为他激烈地抨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全盘反传统的激进主义”,他甚至认为文革的浩劫都能够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寻找到远因。无论其观点及其新儒家背景有多少可以讨论的余地,应该肯定的是其观点与文化姿态引起了学术界对激进主义的认真反思,对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重新审视。于是,林纾、国故派、学衡派、整理国故、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等,都得到了重新评价。进而,人们对文言与白话、新体与旧体、所谓主流、支流与逆流的认识变得复杂起来,复线交织、多元共生的文学史景观越来越清晰地还原出来。

木山英雄早在1966年就关注过毛泽东的旧体诗,1994年发表《旧诗之缘——聂绀弩与胡风、舒芜》,2001年发表《〈沁园春·雪〉的故事——诗之毛泽东现象》。在此前后,他对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之间的关系也做过历史考察与哲学探寻。^④在海外汉学的启迪下,人们意识到,新与旧之间,不只有对峙、冲突、阻遏的一面,也有竞争、互渗、互动的另一面。现代的旧体诗词、文言文学与通俗小说,不仅在历史时段上属于“现代”,而且其创作动因、社会与心理内涵、审美形式的变异及其影响,都程度不同地具有现代性,因而,尽管目前仍有学者坚持绝对排斥的立场,但现代文学界越来越

趋于将其视为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有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开始尝试将旧体诗词纳入视野,研究现代旧体诗词的论文时有发表,专著至少已有两种问世;^⑤“民国文言小说史”也已获得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多种文学史著作作为通俗小说列出专章专节,梳理通俗小说与新文学小说交织并行与互渗互动的历史关系,阐释前者或隐或显的现代性因素,在文化生态平衡的框架中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脉络上,肯定从张恨水到金庸所代表的通俗小说的历史地位。近现代通俗文学专史,也有不止一种问世。

近年来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诸如叙事学、谱系学、解释学、地理学、生态学、图像学、语言学、自由主义、新历史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东方主义、后殖民、知识考古学、女性主义、文化政治及公共场域、宏大叙事、想象共同体、身份认同、社群、身体政治、性别政治、市民社会、他者、文化霸权、戏仿、狂欢、元叙事等理论、观念与方法,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了广泛的影响,研究视野大为拓展。物质文化方面,有稿费制度与文学发展关系的研究;有邮政、通讯、生活方式对文学影响的研究;制度文化方面,有关于三四十年代政治审查制度的研究,也有关于“十七年”审查内在化——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绿皮书”出版前作家对旧作的修改——的研究,以及微观的政治文化心理与宏观的制度文化研究;传媒文化方面,有商务印书馆、泰东图书局、北

① 参见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绪论与严家炎《序》。

② 参见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三联书店1998年版;吴秀明、张锦《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新时期以来内地学界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6期。

③ 穆善培译,崔之元校,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988年再版。

④ 参见木山英雄著、赵京华编译《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⑤ 吴海发:《二十世纪中国诗词史稿》,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胡建建:《民国旧体诗史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新书局、开明书店、生活书店、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新华书店等出版机构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也有《申报》及其《自由谈》副刊、《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大公报》文艺副刊、《益世报》文艺副刊、《解放日报·文艺》、《新青年》、《小说月报》、《礼拜六》、《紫罗兰》、《新潮》、《语丝》、《现代》、《论语》、《抗战文艺》、《文艺复兴》、《文学季刊》、《文学杂志》、《万象》、《文艺报》、上海小报、东北期刊等报刊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地域文化方面，仅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就包括吴越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巴蜀文化、上海城市文化、东北黑土地文化等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教育方面，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西南联大、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东南大学等与新文学之关系的研究；宗教方面，涉及道教、萨满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及其传教士等；民族文化视角，有关于老舍与满族文化、沈从文与苗族等的研究；性别文化，主要是女性主义视角，有对冰心、庐隐、丁玲、萧红、张爱玲等女性作家的解读，也有对男性作家文学世界中的性别歧视的批评，还有男性性别视角的研究，体察文学所表现的现代生活中男性的种种困境。

第三，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繁多多样的文化背景、错杂交织的知识结构与面对不同对象讲授不同课程的工作任务，促使海外汉学家自觉不自觉地游走于不同学科之间，因而总体上具有跨学科的学术特点，学者也形成了各自的学术特点。如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等信手拈来的比较文学细读，竹内好、伊藤虎丸的思想史方法，丸山昇、北冈正子、铃木正夫的实证，等等。

开放的文化研究方法，新颖的异域学术特点，海外汉学家的实践与成绩，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提供了丰富的启迪。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从小事件看大历史、大道理，给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送来了一股清新之风。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对施蛰存的看重和对阮玲玉电

影、百乐门舞厅、哈德门香烟、石库门房子、周璇流行歌曲等上海都市文化现象的“发现”，促进了现代派研究，也拓展了现代文学的都市文化视角。刘禾、陈建华等运用知识考古学方法追溯现代文学话语的历史，给人以方法论的示范。

丸尾常喜借助历史学、思想史、宗教学、民俗学等多种方法，对鲁迅作品中的传统文化原型做了富于原创性的还原式研究。在解读《孔乙己》时，丸尾常喜除了注意到《论语》中《子罕》、《子路》、《子张》等篇的相关性之外，还征引了《孟子·滕文公上》、朱熹《四书集注》、《荀子·致士》、《荀子·富国》等文献，在儒家思想的流脉上来寻绎孔乙己身上的传统文化阴影。与此同时，丸尾常喜也在孔乙己身上看到了民俗文化的鬼影。“在民众中间，孔乙己头脑里的知识没有任何权威，这就势必铸成了在柜台前站着喝酒的孔乙己的‘寂寞’。”如果民众看重那些知识，纵使科举落第，孔乙己与民众的关系也会是另外一种情形。然而民众衡量价值的砝码不是知识本身，而是能否用那些知识换来科举的功名，若被科举拒之门外，在民众心目中就只能“科场鬼”的落魄凄惨形象。^①这样，短衣帮在咸亨酒店对孔乙己的哄笑与他们看舞台上的“科场鬼”时的笑就有了相通之处。关于鲁迅世界中的“鬼”，竹内好在《鲁迅》中已经触及，尾上兼英也曾就《阿Q正传》序章里“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提起过问题，伊藤虎丸、木山英雄等受此启发，展开过讨论，但“彻底挖掘这一题目并且提示出战后日本鲁迅研究史上划时代深刻解读的，则是丸尾常喜的近著”《“人”与“鬼”的纠葛》。^②丸尾常喜把“鬼”的影像作为视点，从经典文化与民俗文化两个方面追踪传统的鬼影，进入了

① 丸尾常喜在《“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秦弓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二章第一部分里说明：“最早指出孔乙己与陈士成的形象同《目连戏》的‘科场鬼’很相似的，是夏济安。”

② 参见伊藤虎丸著《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39～340页。

一个幽邃广袤的文化原型世界。在分析《白光》时，丸尾常喜从陈士成的掘藏上溯至具有中国传统祭祀演剧典型特征的绍兴地区“庙会戏”，指出：“小说《白光》不单是以鲁迅的叔祖子京这一特殊的悲剧性人物为模特，它是作为对于科举制度所浸透的社会产生的庆祝剧《跳魁星》与《掘藏》的模仿与生发改造的化用式讽刺作品而写出的。”《白光》利用了《掘藏》的框架，而且在“试院的照壁的面前”茕茕孑立的陈士成身上，重叠着被科举制度捉弄了一生的“科场鬼”形象。对于“鬼”的捕捉，在《阿Q正传》的分析中最为集中，也最为复杂。在阿Q身上，丸尾常喜看到多重鬼影：第一重是正统观念之鬼，诸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若敖之鬼馁而”，“男女之大防”之类；第二重是积淀在国民性中的“亡灵”，具体说来，就是等级意识、愚昧、保守、狭隘、精神胜利法等种种精神弊端；第三重是民俗文化中的鬼，即生计无着的饿鬼、含冤而死的幽怨鬼、香火断绝的孤魂野鬼，等等，多重鬼影相叠，构成了阿Q这样一个深深植根于中国精神历史与民俗世界的典型人物。丸尾常喜还在《“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中阐释“阿Q=‘阿鬼’说”时，把目连戏作为重要参照系，认为《阿Q正传》的结构与目连戏所保留的“幽魂超度剧”具有同构性：（一）“鬼”的生涯的陈述；（二）审判；（三）团圆。另外，从阿Q“恋爱悲剧”中的挨打出逃、被迫接受赵家的五项惩罚、在静修庵菜园里发现萝卜以及与尼姑的纠葛等场面中，也看出对目连戏的化用。《“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中译本印行三版四次，其影响已经超出鲁迅研究。

正是在海外资源的启迪与刺激下，中国现代文学界在发扬光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美学方法的同时，建构起一个开放的方法论体系，使得领域的拓展与纵深的开掘成为可能。

二、负面效应

然而，海外学术也有其局限性。譬如，有

的学者已经指出，夏志清的研究视角和批评方法“往往表现为一种脱离文化历史语境的片面的深刻，正像他批评鲁迅的‘温情主义’使其不能跻身于赫胥黎等世界讽刺名家之列那样，既洞察到研究对象被遮蔽的内涵，又给对象带来新的遮蔽。夏志清的这种洞见与盲视并存的局限，正是解构主义批评家保罗·德·曼（Paul de Man）从语义学揭示的美国新批评的局限——把文学仅仅限定于文本研究所必然产生的困境。”^①对道德意义与心理深度的肯定诚然有理，但对文化历史语境与社会意义缺乏应有的注意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对此，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早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问世不久，就曾有过批评。

即使是在异域对象世界得以成立的学术观点与行之有效的办法，挪用于中国现代文学也未必完全适用。王瑶曾经指出：“以西洋的文学观念和文艺派别来处理中国文学史，因为彼此历史发展的内容不同，自会有参差不和的地方”与“貌合神离的地方”，因此，我们考察中国文学的发展时，不能机械地照着去比附。^②王瑶“晚年还对在文学研究中生搬硬套外来的观念术语的做法，持保留态度”，“他批评喜欢堆砌外来新术语自炫的文章‘艰涩难读’，而且嘲讽说：‘如果也学着用某些新词来说明的话，就是过于陌生化是会影响接受主体的量的构成的。’”^③令人遗憾的是，王瑶先生已经作古二十余年，“堆砌外来新术语以自炫”的文风并未绝迹，有人甚至藉此扶摇直上，暴得大名。

海外学术既有的局限性与移植的“水土不服”，必然会引起一些负效应。近年来，打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著述，民族国家一词触目可

① 祝宇红：《夏志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及其批评谱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2期。

② 王瑶：《中国文学批评与总集》，《光明日报》1950年5月1日，参见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兼及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王瑶和他的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23页。

③ 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兼及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钱理群等编著《王瑶和他的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23、456页。

及，先前用到国家概念的地方，每每被置换成民族国家。谁若不用民族国家，似有落伍之嫌。这种倾向的源头有两个：一是民族国家理论本身；二是海外学者运用民族国家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所作的阐释，譬如刘禾就认为：“‘五四’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①

西方民族国家理论主要是在欧洲近代历史基础上形成的，想象共同体的观念则产生于安德森对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的考察与思考，简单地拿过来套用于中国问题，势必会产生错位。刘禾说，“凡是能够进入民族国家文学网络的作家或作品，即获得进入官方文学史资格，否则就被‘自然’地遗忘。少数幸运者如萧红，则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被权威的文学批评纳入了民族国家文学，才幸免于难。”^②事实上，包括萧红《生死场》在内的许多现代文学作品之所以为文学史所关注，并不是因为他们进入了所谓“民族国家文学网络”，而是因其切中了个性解放人性解放和启蒙与救亡交织互动的现代脉搏。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与40年代战国策派倒是属于“民族国家文学网络”，但是长期不能正面进入文学史叙述，却是另有原因。

有一部探讨文学史写作问题的著作认为，“传统‘中国’是一个依据文化认同建立的共同体，而现代‘中国’则是一个依靠政治认同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范畴，近代以后的中国认同都建立在对以文化认同为基本内核的传统中国认同的超越之上。也就是说，‘中国’是一个人造的事实，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是西方全球化的产物。这意味着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出现的所有‘中国问题’必然也是西方问题，所有的中国理论都必定是西方理论。”“民族国家本身实际上主要是19世纪的产物，是欧洲帝国所缔造出来的，但是，在对民族国家的虚幻想象中，它却被描述成一种统一的、内部整合的、甚至是单一的自古就有的实体。现代中国的建构也完整地体现了这一过程。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几千年完全靠文化立国的国家，借用传统文化认同来达至认同政治

文化当然是事半功倍的捷径。这就是有关现代中国的表述常常与传统中国缠绕不清的原因。建构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甚至被形象地表述为‘救亡’，政治使命被表述为文化使命，这种偷梁换柱的手法一用再用，屡试不爽。”^③在此书作者看来，传统中国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只是一个文化认同的想象共同体。事实上，中国的历史迥异于欧洲。如果把夏、商、周看作天子象征性管理的原始国家的话，那么，秦始皇则开创了实质性的君主帝国时代。秦朝实行郡县制，车同轨，书同文，货币与度量衡均天下一统，其统治南至岭南，西至流沙，民族构成不止于最初的华夏，也包括夏、商、周时的方国戎狄及肃慎、氏、羌、濮等远夷，可以说，秦朝牢固地奠定了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而后，虽有内部纷争、朝代更迭、版图变迁，但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形态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比较起来，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是从帝国分裂而来的现代民族国家，国家形态、版图、主权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而现代中国不是传统帝国分崩离析的碎片，而是国家实体的整体继承，改变的只是政治制度，由传统民族国家经过革命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国家形态、版图、主权、国民的主体一仍其旧。还有论者把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起点放在1949年10月。有一篇博士论文，就把当代革命历史小说书写现代史题材说成是为了建构民族国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从观念体系到表述方式都缘自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说法，显然违背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事实，背离了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中华一统的思想谱系。连基本的历史背景都搞不清楚，文学史的判断哪里靠得住呢？

台湾有学者用后殖民理论来看待中国文化与台湾文化的关系，认为抗战胜利、台湾回归中国之后、特别是国民政府迁台之后，中国文

①② 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生死场的启示》，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页。

③ 李杨：《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298、304页。

化对台湾的统合是一种后殖民现象。大陆也有学者用后殖民理论看待少数民族文化问题，认为汉文化对少数民族地区也存在着后殖民问题。如此这般，貌似深刻，实则谬误。

任何观念与方法，都有其适用范围，一旦恣意而为，必然漏洞百出。如有的学者借用女权主义与心理分析，认定鲁迅之所以对朱安没有爱情、对母亲有所抱怨，是因为新婚之夜作为男性在妻子面前遭受了挫折，遂把失败的惭愧与羞辱转化为仇恨。这哪里是严谨的学术研究，分明是故作惊人之语的低级噱头！

在不断涌来的海外新潮的冲击下，求新成为学术时尚，唯新是求，生吞活剥，缺乏审慎的选择，缺乏契合实际的化用，缺乏创造性的更新，往往一个观念尚未吃透，一种方法未能熟练，便又去追逐新的观念、新的方法。求新急切，而对新观念新方法本身的局限性以及移植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缺少冷静的反思。有的学者审慎对待新潮，便受到“落伍”之讥。文化研究本来有助于拓展文学研究视野，但是，文化研究大潮澎湃，对文学研究形成挤压的态势，仿佛文学研究已成明日黄花。盲目求新，不仅对新的不求甚解，食洋不化，对学科的基本问题有所忽略，而且还带来了新概念大轰炸、表达晦涩、诘屈聱牙等问题，正所谓以艰深文浅陋。

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相当复杂。一则由于年轻人敏感，吸收新鲜营养操之过急，结果造成了消化不良；二则出于对西方的盲目崇拜，养成了所谓“汉学心态”；三则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图的是带有新名词的论文容易发表；四则利益互惠，海内外彼此征引，相互夸赞，对等邀请，等等。

海外学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说，确实具有可贵的资源价值，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尊重，认真选择，主动汲取其养分，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我们的学术研究之中；但是，海外学术本身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对此，我们应该有所警惕，防止把异域学术的“污染企业”搬到中国的土地上；我们还应该注意海外学术在中国的适应性，避免因国情的隔膜而产生副作用。只有在选择、汲取、转化的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对海外资源的引进才能更为自觉，更加有效，进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在国际学术对话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本文作者：重庆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马光

Double Impacts of the Overseas Resources on China's Modern Literary Research

Qin Go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overseas resources have deeply impacted China's modern literary research both positively and negatively. On one hand, there are updates on concepts of literary history, extension in academic vistas and diversity of research methods; On the other hand, confusion, blind pursuit of novelty and willful assumptions are unavoidable. The double impacts need thorough examination so that we can draw on overseas resources properly and construct an academic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y this way, it will be possible to improve academic research and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 cultures on equal terms.

Key words: overseas resources; China's modern literary research; double impacts